

我們的英雄人民

革命回憶錄

51996

研究所

越南外文出版社

我們的英雄人民

我們的英雄人民

•

出版：越南外文出版社
承印：新越華報印刷廠

•

1961年4月・河內

出版者的話

自從1930年成立了印度支那共產黨(越南勞動黨的前身)以來，越南人民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正確領導。在黨和胡志明主席的領導下，我國人民進行了廣泛的革命運動，終於在1945年的8月革命中，粉碎了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枷鎖，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開闢了越南歷史的新紀元。但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和國內的反革命勢力並不甘心失敗，它們互相勾結，企圖消滅我國人民的革命政權，在我國重新建立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制度，八月革命勝利後不滿一個月，法國殖民主義者就在我國南方發動了侵略戰爭，1946年12月，侵略戰爭蔓延全國。爲了維護民族獨立，我國人民響應了黨和胡主席的救國號召，萬衆一心，共同奮起，堅決進行保衛祖國的神聖抗戰。我國人民長期英勇的抗戰獲得了社會主義陣營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1954年奠邊府大捷和日內瓦會議後勝利結束了。所有這一切輝煌勝利，都是在黨和胡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取得的。1960年是黨誕生的三十周年，爲了紀念這個光榮的節日，越南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革命回憶錄——“我們的英雄人民”。這些回憶錄雖然只反映了越南革命的一些片段，但從這裏面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戰無不勝的力量，黨和胡主席卓越的領導，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羣衆的革命英雄氣概。現在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介紹給兄弟般的中國人民，我們感到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越南外文出版社

一九六一年·河內

目 次

在黨和人民的懷抱中成長·····	阮良朋 (1)
鋤頭黑牢·····	范 雄 (38)
隨時準備上鋤頭機·····	黎文良 (45)
從人民中來·····	武元甲 (54)
我們的英雄人民·····	黃國越 (92)

在黨和人民的懷抱中成長

1925年底，我才二十多歲，是個海員。那時候，我剛離開廣東號輪船轉到一艘停泊在沙面——廣州法租界——的法國兵艦上做工。遠離家鄉的我，每次一上岸，走出法租界，便找人交朋友去。都是年輕小伙子，一碰頭就很快的親熱起來。

就在那時候，我認識了錦順哥。

錦順哥是中國人，曾在越南住過，越南話說得相當流利。他常邀我出去玩，我們很快地成了親密的朋友。錦順哥和愛人都是革命工作者，聽兄弟們說：他的愛人很活躍，經常披着紅巾在工人中活動。

有一次，是星期天，錦順哥買了花，邀我到黃花崗謁范鴻泰的墳墓。面對先烈的墳墓，我心裏感觸無限。不久，錦順哥給我介紹兩位越南朋友，一位叫益哥，一位叫王哥。

益哥就是胡松茂同志，是他介紹我參加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的。在入會宣誓典禮上，王同志也在場，但他很少發言。當時的廣州，正是中國革命的首都，街上日日夜夜地沸騰着工人羣衆、人民羣衆集會遊行的熱流。每當我能從法租界出去看望同志們，益同志和王同志便把我們帶進附近街區的隨便哪一個工會辦事處，借這些地方，作爲就地訓練我們

的臨時課室。

時間過了一年多，有一次，王同志和我作個別談話。他問：“你有沒有回國住下去的條件？”

“我可以回去，如果組織需要，我馬上走。”

我回國的事情，是王同志親自籌措的，在交任務的時候，他很周到地再三叮嚀說：

“回去後，別忙着活動。觀察一個時期後再說，可小心別給密探跟踪上啊。”

我回到海防後，住在橋頭街。正如王同志所說，法國的密探果然整天在我的門前監視着。我攔下一切，到處閒逛，直到敵人不再釘梢時，我才悄悄地去找與香港聯系的聯絡站，把材料取回來。

1927年4、5月間，我到桑波號輪船工作。這艘輪船在海防、香港、廣州綫航行。每跑兩趟香港就有一趟開入廣州。因此，對我們的交通聯絡很是便利。我們把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出版的青年報、革命之路和其他材料秘密運送回國，然後分發給南定、海防、河內等城市的熟人。

有位朋友叫劉伯語，他經常傳送我發給他的宣傳品。在他傳送報刊的讀者中，有個書店老板叫阮猛棒，原是法殖民主義者的走狗，他拿我們的報刊材料向法殖民主義者告發，因此劉伯語被捕。劉招認報刊材料是由一個叫老三（我的化名）的海員交給他的。

敵人把所有的輪船都搜遍了，也找不到名叫老三的人，因為一有風聲，我早就辭掉桑波號輪船的工作，回到太平市就轉赴西貢。

到了西貢，我又會見了幾位從廣州回來的老同志。當時組織上由吳添同志和我們聯系。我們經常看到他老在我們住

處斜對面的一間屋子出入，因為保密的原則，我們從來不問他有關那屋子的事。革命勝利後，大家談起往事，孫伯伯（即孫德勝同志。——譯者）才告訴我們，那間屋子正是他和范文同同志當年的工作機關，他們與吳添同志都住在一起。

在西貢，有從泰國寄回來的秘密書報。1927年至1928年底，革命運動已相當發展，地下報刊也比過去增多。可是專業搞革命的幹部，生活却很窮苦。我們小組裏的兄弟都是一面做工，一面搞活動。雖然六七個人每餐只有一鍋飯，幾分錢空心菜和一兩個與鹽水攪在一起的鴨蛋糊，但總算是有飯吃。

吳添同志是我們小組的負責人。一天，他到我們小組開會，我們問明他還沒有吃過飯，便特給他買來一碗粉條。吃後，他才告訴我們說已經三天了，一直沒有一粒飯下肚，因為機關連一個銅板兒也沒有了。聽他這麼說，我們都噙着熱淚，吳添同志也陪着我們掉淚。大家深深的體會到革命同志間那種互相照顧、愛惜的情感。從此，我們小組更加注意縮食節用，省下錢來幫助吳添同志的生活。

在西貢柏比耶路案件①發生前，我已由西貢轉回海防，繼續活動。那時，海防的基層組織很不錯，有一百多位同志。

1929年初，青年革命同志會圻部②提出所有青年同志都要無產階級化的主張，大家都要穿藍色衣服。誰能够進工廠做工的，就應想盡辦法來打進工廠。誰沒有辦法進入工廠做工的，也應搞一種勞動職業，不論哪一行都好。我到處托人

① 我們在柏比耶路處死一個叛徒以後，殖民者進行恐怖鎮壓，基層組織被破壞，一部分同志被捕並被判刑。

② 圻部：當時越南分三圻，組織系統上次於中央級的稱圻部。
——譯者註。

介紹進卡龍工廠工作，但總是失望。爲了執行上級的指示，我和一部分同志就當起黃包車夫來。

無產階級化的主張，立即起了它的直接作用。哪一家工廠有我們的同志，那兒就有了革命的活動。就是在黃包車夫羣衆中革命工作也同樣的活躍。1930年，海防黃包車夫就有過一次總罷工。

黃包車夫這行職業，給我到港口和各來往船隻的聯絡工作以很大的便利。

有一天，有人來通知我說，有我們的兄弟從香港乘日本輪船到了海防。因爲沒有錢補還船票，輪船資方不讓他們上岸。這幾位兄弟，原來是吳家嗣等同志，他們是屬於北圻組織派赴香港，參加青年革命同志會代表大會的代表。他們由於意見不合，半途退出會議，因而沒有錢買船票。沒有錢還是硬着頭皮下船，並大胆地向輪船資方說，只要回到海防，船一靠岸，就有人來補還船票。這幾位同志的勇氣可不小！

一位同情革命的婦女，知道了這事情，立即賣掉自己的首飾，替吳家嗣等同志付還船錢。

我接吳家嗣同志到我的住處住了一個時期，不久，他回河內，發表了印度支那共產黨成立宣言後便到西貢去。

×

×

×

1929年年中，青年革命同志會總部調我專搞由香港到廣州的交通聯絡工作。

在國內的組織是印度支那共產黨，但在國外仍是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

我剛離開海防，在海防致知會的機關後面一條小巷裏，恰好發生氏柔和氏婉的暗殺案。這小巷直通三朥巷，我的家

就在這條巷裏。法帝國主義的密探對案件作現場調查，並勸查我的家，搜出了幾份油印的紅旗報。當年的紅旗報，正在宣傳工人階級政黨的組織問題。由於敵人在我的家裏搜出了紅旗報，所以住在這裏的兄弟，連我的母親在內都被他們抓去。

到香港後，我又混進一艘法國兵艦上做工。兩個月後，法帝國主義在越南的密探長黎龍，親自來到了廣州，這傢伙專門負責調查有關政治問題的案件。他深入到法帝國主義海軍俱樂部裏，暗地進行搜索。我暗自着急，心想，這一回可要準備雙手上鐐銬啦！可是，這場風險我又幸運地避過去了。我向組織建議，讓我離開那裏。負責同志却指示我，應安心留下。當時，我一方面搞香港與廣州之間的交通聯絡，一方面又為組織籌措經費和搞對水兵的宣傳組織活動。

四個月後，國內的組織寫信通知我們，答應讓我離開現有的工作崗位，因為法帝國主義正加緊對我搜索緝捕。就在這個時候，一位青年革命同志會的同志向我作入黨的宣傳，他問：

“黨已在國內成立了，你的想法怎樣？”

“我想：哪一邊是正確的，我就跟那一邊跑。”

“你對青年革命同志會的看法怎樣？”

“青年革命同志會的歷史使命到現在已經完畢。照國內目前的潮流看，應該立即成立黨。”

“照你的意見，應組織像國內的黨呢？還是像國外的黨？”

“像哪個黨都好，只要是符合無產階級的目的、宗旨，我就參加。”

“印度支那共產黨（指吳家嗣同志等當時剛組織的黨。

——譯者）還有不够的地方，因此我們組織了安南共產黨。但印度支那共產黨與安南共產黨這兩個組織，將來總要合而為一的。”

“我在外頭，參加安南共產黨也可以，但我希望所有的共產主義者，應迅速地把組織統一起來才好。”

1929年10月，我被批准入安南共產黨。

我入黨後，組織在交給我新的任務時，提出了三個工作方向，並讓我自己選擇。第一是國內正需要幹部，我能回去是最好的事。然而在國內我已暴露，因此黨要我到雲南幫助那裏的同志，在越僑中進行活動，或者到上海，在越僑中和越南籍士兵中發展基層組織。

作為一個青年人，我也有喜歡困難和愛好新奇工作的性格，我毫無顧慮地向組織申請到上海去。負責同志交給我一張六塊錢的船票，囑咐我到上海後，要自己解決本身的生活問題，並限定到上海後三個月內，應在羣衆中建立起組織。

在上海的法租界，共有四千名越南藍綁帶兵[⊖]和紅綁帶兵，此外，有越南工人以及工人與士兵的家屬，總共約六千人。在法租界的駐軍中，還有一千名法籍士兵，黃浦江上經常停泊着法國的軍艦。從法國馬賽開赴日本橫濱的輪船，經常進出上海港口。我懂得上海是個很重要的地點，然而在上海，我連一個熟人也沒有，又不懂上海話。我拿着那張六塊錢的船票，越想越擔心，越加意識到等着我的工作，委實棘手。

絞盡腦汁想辦法，我終於想起黑三哥來，他是越南青年

⊖ 藍綁帶兵：打藍綁帶的保安兵。還有打紅綁帶的是正規軍。

——譯者註。

革命同志會在香港所組織的炊事工人工会的會員（黑三哥現在河內人民報的印刷廠工作）。他在上海是有熟人的，我便請他寫封介紹信介紹我與他的熟人相識。

到了上海，我暫時住在小客棧裏。我找到了黑三哥的朋友說哥（他在上海學習醫科），並告訴他，我到上海來，是爲了找活做。他說：

“在這裏找活可不容易。你就暫時同我們住在一起好啦。”

說哥與昂哥、陳三哥兩位越南同鄉，合夥開了一家陳三飯店。顧客主要是士兵。陳三是飯店的經理；說哥一面讀書，一面負責店裏的賬務；昂哥則替一個法國老板燒飯，並兼飯店的採辦；而我就充當了飯店的僕役。

在飯店幹了幾天活，我便找到了建立組織的機會。事情是這樣的：一天早晨，在上海的一家法國阿西然工廠中做工的幾位工人，到飯店來捐款，收殮一位在海輪上病死的工人。看到這些弟兄們這麼熱心公益，我便找機會到他們的住處玩玩。他們都是越南南方人，有愛國精神和正義感，但還沒有誰對他們作過革命宣傳。

我同他們商量，成立一個互濟會的組織，使大家在遠離祖國的異鄉，有事可以互相支援、幫助。這樣，我到上海不滿一個月，就向香港的組織報告了我在工作上所獲得的結果。

羣衆組織從工人擴大到炊事工人、打雜的僕役，以及商人等羣衆中去，並由此，在法國兵營中也取得了聯系。起初是打進紅綁帶兵中工作，跟着就深入到藍綁帶兵，後來連水兵的隊伍中，都有了我們的基層組織。於是，我着手在羣衆中建立黨的組織。

運動迅速地發展，我一個人已照顧不了，忙向香港組織

報告，請求派幾位同志到上海與我共同工作。組織先後派來了五、六位同志，其中有汛朱同志。汛朱同志原名杜玉俞，是建立河內第一個黨支部的七位創始人之一。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約我會面的匿名情信，碰頭的地點是先施公司——上海一家規模很大的百貨公司的彈子球房。我準時到達約會地點。沒看到誰，我立即轉身走開。正走着，背後突然有人把我喚住：

“二哥！”

我轉過頭來，高興極了，原來喚住我的人正是王同志。

×

×

×

王同志把我拉到街上，約我隔天見面，並把他住的旅館的地址交給我。當然，我不能對王同志失約。第二天，我到王同志那裏，把工作情況向他作了詳細的匯報。王同志介紹我同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們取得聯係。

最先在上海和我聯系的中國同志，是蔡暢同志——現在是中共中央委員。蔡同志親自到我工作的地方找我，把我帶到一家相當豪華的旅館裏，並給我介紹一位正在那兒等我的——一位中國同志：

“這位同志是黨中央委員，特來與你討論工作的。”

中央委員同志提出關於對在上海的外國士兵進行兵運的問題，並和我商量對法越籍士兵所進行的具體工作，供給我們印刷傳單的必需品如鋼版、鐵筆、臘紙等。

上海地方是那麼大，有了傳單，應怎樣散發呢？中國同志說只管把需要散發傳單的地點標明出來，自然有傳單散發隊來負責散發。當年，中國同志在上海的工作，已有很大的進展，散發傳單的工作有專門的、人數衆多的散發隊負責。宣傳

鼓動工作的廣泛和活躍，像我國八月革命起義前夕的情況。

有一次，我在一個基層組織的屋裏和同志們談天，突然，從外頭拋進了許多中國散發隊散發的傳單。同志們把傳單撿起來，大家很得意地說：

“看起來，我們越南人在國外搞革命的，可也不少啊！”

傳單越散發得多，運動就越像趁着風勢的火焰。

由於工作發展的迅速，和中國共產黨的聯系亦跟着更加密切。中共中央特成立了一個“外國士兵工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有越南和日本同志參加。中國同志直接負責對英國士兵的動員工作。日本同志負責對日本、朝鮮、台灣等（當時朝鮮、台灣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屬地）士兵的動員工作。我們則負責對越南士兵和法國士兵的動員工作。一位日本同志開辦的一家書店，做了我們和組織的聯絡站。此後，工作更加擴展，中共中央便把“外國士兵工作委員會”交給江蘇省委。依靠地方黨委，宣傳、動員工作更加有力地發展了。

我們的工作逐漸向法國士兵方面伸展。陳三飯店是士兵們經常出入的地方。誰都知道，法國軍人進酒吧飯館的拿手好戲是酗酒、亂砸東西。但在他們中也有態度文雅，舉止守禮，面色善良帶着憂鬱的人。碰到這一類的法籍士兵，我便設法接近他們，找話和他們談心，接着便把他們介紹給熟識法語的汎朱同志，邀請他們逛街、談心。這些法國士兵，和我們接觸後，有的吐露說，他們在法國已參加法國的黨組織，或黨的外圍組織。

不但在“紅綁帶”兵、“藍綁帶”兵、法籍兵的隊伍中有了我們的宣傳活動，連法國軍艦上的法籍水兵、越南南方水兵、以及商船上的海員中也有了我們的宣傳活動。經常航

行馬賽、橫濱綫的九艘商船如達爾大雅號，阿多斯第二號，色農蘇號，斯班號，波爾托斯號……都建立了基層組織。每一艘輪船都成立了海員工會（唯有斯班號只有兩名越南籍海員，因此不能成立工會），有的輪船還發展了新黨員。因此，我們從上海到香港、西貢，直至法國首都巴黎的地下交通聯絡綫，都非常便利。

中國同志的傳單散發隊，對外國士兵分發傳單，是照着上海地圖上標明的地點，只把傳單丟在門口、圍牆內或輪船上，或是當士兵在街上閒逛時，塞到他們的手裏而已。看到運動這麼高漲，我們便親自負起散發傳單的工作，因為在各地都有了我們的基層組織，我們能够把傳單散發到任何要散發的地方。我們開始出版報紙，第一份取名覺悟（供給一般越僑和士兵閱讀），後來又出版了專給越南籍士兵閱讀的軍號報和給法國籍士兵閱讀的紅軍報（Armée rouge）。

我記得王同志曾給我們的報寫過一些韻文和白話文的文章。我在上海和王同志一共見過四次面，最後一次是王同志到我們機關參加會議，並拿出我們出版的報紙逐張分析和批評，指導我們關於辦報的方法。那次的會面，使我對他細緻的、周到的工作作風，有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的工作過程中，使我最感興趣的一樁事，是在法國軍艦汪德盧梭號——該艦曾於1918年在黑海升起第一面起義的旗幟——成功地建立了我們的基層組織。艦上的同志把傳單貼在飯廳、廁所裏，後來，連艦上指揮官的抽屜裏也有了我們的傳單。搞得那些藍眼兒的指揮官暈頭轉向，雖然拼命拷問搜查士兵，却得不到什麼綫索。艦上的同志們，被勝利沖昏了頭腦，1930年十月革命紀念日，竟提議在艦上的主桅升起紅旗，要重演當年在黑海起義的英雄事跡。黨組

織極力勸阻兄弟們不要盲動，要求他們好好地保護艦上的基層組織。

但是，使我們對工作更加陶醉，幹勁更加高漲的是什麼呢？在具有歷史意義的1930年，讀着從國內寄來的公開報紙，載滿國內革命運動蓬蓬勃勃發展的消息，對我們起了一種極其強烈的鼓舞作用。尤其是關於宜安蘇維埃的消息，使遠離祖國的我們，心田的革命烈火，益發熊熊燃燒。在我們中，有位名叫國隆的同志，他是宜安省人，黃埔軍官學校的畢業生。他拋棄了在蔣介石軍隊中的軍官職位，跟我們一起搞黨的秘密工作。有一次，他拿着一份剛從國內寄來的報紙，興高采烈地喊着：

“聽！聽！好極了！遊行示威就發生在我的老家。”
他那種狂喜的心情，是難以描繪的。

胡玉覽老先生，當時是蔣介石的總參謀部中的高級軍官，有一次，他老人家從南京到上海來看我們，邀我們到一家飯店吃飯。在談話中，他說：

“祖國的革命運動這樣高漲，如果黨需要的話，我可以申請回去指揮軍事。”

×

×

×

1930年年底，我第一次被捕。原來敵人已對我追蹤了好久。有一次，當我從烏斯若工廠出來時，立即被法帝國主義的密探拘住。理由是他們見我每次到過工廠後，廠裏便到處發現傳單。

我身上沒有什麼秘密的文件，一切官方的證件如身份證等却全備。敵人再三搜查我的全身，只發現他們認為可疑的一大把電車票。我身上所以帶這麼多的電車票，原因是黨的

財政紀律很嚴明，就算支出一個銅板，也應有報銷的憑據。

敵人看着那堆電車票，回頭追問我：

“爲什麼你有這麼多的到過日租界、英租界、甚至中國城（當時對上海各國租界以外的中國地區的叫法。——譯者註）的電車票？”

我鎮靜地回答：

“我經常到各個公園逛逛。各租界和中國城有許多美麗的公園，我一有空就到以上地區玩。”

我看出敵人已懷疑我是什麼人了，便一味逼上去說：

“我到上海是爲了找活做。如果先生們有什麼活請介紹給我，我馬上幹。”

敵人命我面向牆壁站着，並傳來了陳三，問他：

“你店裏收留過一個叫阮良朋的麼？”

“阮良朋？沒有，我們店裏從沒有收留過誰叫阮良朋的。”

密探長拉我轉過身來，怒氣沖沖地問陳三說：

“你沒有收留過這個人嗎？”

“有。他叫老二，是到我們店裏暫住，等找職業的。”

密探長聽後，吩咐陳三說：

“我把這個人交給你，你可要負責養活他，直到有輪船回安南時爲止。”

於是陳三把我領回去。陳三原是個正在求財致富的商人，平日就不關心革命，政治意識模糊不清，再加上受到欺騙的宣傳，竟認爲蔣介石什麼都行。不過，他對法帝國主義也沒有什麼好感。因此，在我等待被押送回國的這段時間內，他對待我是很友好的。

到了有輪船開往海防的那天，一個叫阿善的藍綑帶兵副